

周作人小说《活孙国》笔记

松冈 俊裕 作 刘畅 译

本稿所论及的周作人（浙江绍兴人，1885～1966）白话短篇小说《活孙国》（1914年6月3日《笑报》第138号，署名仲密¹，“胡言乱语”栏）是几年前由中国的研究者发现的。承蒙其提供原稿的复印件，在此表达诚挚的谢意。该小说的原文及内容在中国国内尚且未被介绍，因此对其进行介绍并论述的本稿在日本自然也堪称首次。那么该小说的内容究竟如何，以下附上原文，以供鉴赏。可是，原文的前半部尚未被发现，本文所介绍的仅为后半部，对此深表遗憾。

原文：

活孙国

他们的牙齿，因为天天嚼骨头更加坚固了；他们的眼睛，因天天看牌背更加明亮了；他们的淫具，因天天干那事更加发达了。但是不用心思，脑子渐渐缩小，同茶钟一样。看他的形状，已经三分像猴七分像鬼了，又加那天天斲伐，看看人口只有减少，不久就要绝灭。可怜他们毫无知觉，兀自胡闹不休，那人国的人看不过去，曾经屡次会议，想个救助之法。但是这类猿人，性质呆而且坏，毕竟撩划不起，只好算他命苦，随他罢了。也有激烈派，主张索性把他一起毒死了，省得流害社会，但是这类猿人倘若死了，腐烂起来，不免酿成瘟疫，也有不便，所以随他去天生天化自过日子。好在即使不去收拾他，他们末路也近了。当时在下说道：这班类猿人的来历已经明白了，但是所谓人国的人，却在那里，为何在下不曾遇见一人？老人指着城外一座山曰：即此便是，他们因憎恶这类猿人，所以不到这里来往。在下又道：老夫不是人国的人，却也不是类猿人。不过与足下一样，同是外来的旁观者罢了！说罢便同在下作别，扬长而去。²

本小说的发现者陈子善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一次他在当地的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阅览《笑报》（残缺）时偶然发现了这篇文章³。陈子善在《笑报》里发现的周作人的文章另外还有两篇。一篇是哀悼留学时代（1906～1911）结识的友人，民族革命家陶成章（号焕卿，绍兴人）的《怀陶君焕卿》⁴（1915年10月24日《笑报》第633号，署名长庚⁵）。陶于中华民国成立后的1912年1月14日遭暗杀身亡。另一篇是介绍留日时期文字学导师，民族革命家章炳麟（号太炎，绍兴人）的幽默性质的随笔《大家谈谈》⁶（1915年10月25日《笑报》第634号，署名长庚⁷）。两篇均为绍兴时代（1911～1917）

的作品。三篇当中的《怀陶君焕卿》(如注4),陈子善在《关于周作人的〈怀陶君焕卿〉》有详细的介绍,并附有原文。余下的两篇,该文仅提及了标题。

登载《活孙国》等的《笑报》是一部绍兴出版的日报,由一个叫杨一放的人于民国3年(1914)1月中旬创办⁸。此外,绍兴的另一份报纸《越铎日报》于1912年1月3日创刊,杨一放据传也参与了该报创刊工作。《越铎日报》是清末民初主张民族革命的南社的绍兴分社——越社的机关报纸⁹(鲁迅也是发起人之一)。周作人在越社发行的《越社丛刊》中发表文章(可能是受到鲁迅的委托)¹⁰,并很有可能与杨一放结识。《笑报》的停刊日期不明,通信处是位于绍兴城内中心街大路的新园,编辑者为周鹿梧(别名周庆龙)。周鹿梧与周作人同姓,但是否同族尚未可知。《笑报》的特点在《〈笑报〉出现》¹¹中已有了充分的体现。其全文如下。

本报以提倡风雅,纠正风俗,开通风气,记录风闻为宗旨,特请海内外鸿儒硕学、滑稽专家、诙谐才子以趣味渊深之笔墨,成陆离光怪之文章。内容无美不备,材料无奇不有,纸张特别美丽,印刷格外精良,要以引起各界人士之兴趣,鼓舞诸等社会之精神。宜雅宜俗,亦庄亦谐,于酒阑灯炆之气,增笑言哑哑之乐。现正拼命筹备,俟大有头绪,即行一笑出世。通信处暂设本域丁家弄绍兴印刷局。如荷同志帮忙,请移玉通信处,与杜君接洽。哈哈!¹²

《笑报》同人笑言

单纯地把《笑报》看成是一部幽默报纸是有失公允的。该报虽表面上看似充斥着滑稽幽默作品的幽默报纸,而实际上则是暗含了以时代批判和国民性批判为目的的十分严肃的报纸。该报的长期撰稿人李士铭认为,假借寓言来对世道加以辛辣的讽刺才是其宗旨所在。¹³身处当时的政治环境,将对时代和国民性的批判付之于笑谈恐怕也是无可奈何之举。

北洋军阀出身的袁世凯思想守旧。在他的权力欲望和野心的膨胀下,辛亥革命缔造的中华民国名存实亡。那些旨在打破旧封建制度和儒教支配,实现共和制的维护与发展的北京进步知识分子遭到了守旧派明枪暗箭式的排斥与压迫,暗杀事件层出不穷。为了明哲保身,他们有的出逃海外,有的缄口不语,有的转向民俗学等无关痛痒的学问,有的投身于金石文研究,还有的沉溺酒色不能自拔。尽管地方对于进步的知识分子的压迫不如国都北京那样严酷,公开地对保守派口诛笔伐仍然困难重重。由此推断,在与北京相隔万里的江南小镇绍兴,情况依旧不容乐观。

在保守派势力的打压下,以绍兴的浙江省立第五中学的学生为核心的知识分子于1913年秋创立彘社¹⁴(前身为第五中学学生为中心结成的同志研究社),并发行杂志《彘社丛刊》¹⁵。该社创立的宗旨在于“尊重友情,研究学术”¹⁶。

这里的学术指的是科学知识，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拯救沦落的国民道德（“人心险恶”、“道德衰退”），并创造新国民道德（“祝词二”¹⁷），时任绍兴县教育局会长并在附近中学教授英文的周作人也是该社名誉社员¹⁸，并为其撰稿¹⁹。

彘社创立第二年《笑报》创刊。杨一放创办《笑报》的经过已经不为人知了。恐怕是由于心忧中国及绍兴的现状，才与周鹿梧等进步人士²⁰结社并创刊。将批判讽刺付之于笑谈也恰好反映了绍兴人幽默风趣的个性²¹。杨一放中途才成为了彘社的名誉会员²²，同时就任绍兴县教育局副会长²³。

根据《周作人日记》，周作人为《笑报》投稿共计 35 篇，其中包括文章与诗歌。首次投稿是在民国三年（1914）。同年 4 月 3 日《周作人日记》有如下记载：“作杂文予《笑报》”。这也是周作人的日记中最早的关于为《笑报》投稿的记录。三年后的 1917 年 3 月 7 日，在鲁迅的协调下赴北京大学任教的周作人在出发之前，曾整理过自己登载在该报上的作品（“检阅《笑报》所载旧作甲寅[1914]以来凡三十五首也” [见同日《周作人日记》]）²⁴。由此算来，周作人大致是平均每月投稿一篇，算得上是《笑报》的长期撰稿人了。但周作人与《笑报》的创刊有无关联，以及是否是该报同人都不得而知。

那么，周作人为什么要参加彘社并频繁地为其撰稿呢？

在周作人的日本留学时代，中国正处在道义人心崩坏的深渊。面对惨淡的现实（当时周作人认为中国的现实为“浇世”“末世”）以及亡国灭种的危机，周作人试图用文学，主要是小说、诗歌，特别是利用小说固有的感召力去改造虚伪、罪恶、残暴的国民性，并借此建立属于汉民族的共和国——中华共和国。辛亥革命的兴起与中华民国的成立虽然让他感到欣喜，而革命与民国的现状却也令他忧心忡忡。深切地感受到改造国民性之必要的他从此踏上了国民性改造的路程。²⁵

以上是自日本留学时代以来，周作人所坚持的一贯主张。关于利用文学，特别是小说所固有的感召力改造国民性的构想，可参见《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及中国近时文论之失》²⁶（以下简称“A 论文”）与《哀弦篇》²⁷（以下简称“B 论文”）。在此分别作简单介绍。

周作人在 A 论文的前半部分（《河南》第 4 期登载）中首先把能够防止亡国，或即便亡国也可使之再兴的东西称为“神”（精神=古代精神=古代国民精神<国民性，国魂>），这种优异的古代精神以及包含着这种精神的古代文学后来因儒教的统治而衰竭。后世的中国文学以及儒家思想，都成为了皇帝（周作人记作“一人”）用来束缚人心的工具。根据 TH. W. 宏德的文学论，文学的本质是：一、必形之楮墨者，二、必非学术者，三、人生思想之形现（并非意识形态，是出色的想法与精神之意），四、不可缺者三状，具神思（Ideal）能感兴（Inpassioned）有美致（Artistic）。人接触这样的文学，就等于邂逅了伟大的思想。在后半部分（《河南》第 6 期登载）中，他再次引用宏德的学说来解释文学的使命：一、裁铸高义鸿思，汇合阐发之，二、阐释时代精神，的然无误²⁸，三、阐释人情，以示世，四、发扬神思，趣人生以进于高尚。按照这一

定义与使命，他详细地指出近期所发表的《中国文学之概观》、《中国文学史》（京师大学堂教员林傅甲著）中，自古以来所形成的，文学之目的在于“经世”的实用主义文学论的谬误（中国文学论中最受周推崇的《文心雕龙》也未能幸免）。他指出，文学从来就没有被实用过，也缺乏实效。数千年来在儒教的统治下，思想的束缚与文学的衰退已经在预示着今日中国的衰亡。当务之急是推进文学改革，夺回被皇帝霸占的文学，使之成为万民共有之物。特别是记录国民生活的“民情之记 Tolk novel(应为 Folk novel)”与“奇书谈 marchen”（但奇书多用于儿童教育）的振兴更是重中之重。倘若文学能够如此改革，那么“思想”就会摆脱儒教的束缚，重获自由。因儒教而扭曲了的国民精神也将展现出它的博大精深。但是，周作人将这一切寄托于“未来”，并不指望它能够立即实现。

在 B 论文中，周作人对于中国当下急需的“民情之记”的具体内容加以了阐述。中国长久以来处于暗无天日的状态下，“民德离禁，质悴神亏，旧泽（逸响，古代文学）弗存，新声（新的文学）绝朕”。普通国民无视国运之凋敝，还在熙熙攘攘，赏“北邙”（墓地）以怡情。人心如此“萧条”（“死寂”、“寂寞”）正是由于他们不“觉悟”，而其不“觉悟”，则是由于对悲惨的现状缺少“悲哀”之情。“悲哀”之所以销声匿迹，则是因为“哀弦”（诗人等作家）之声不振。可是，当今大唱改革论调之徒（改良主义者）不但不悲现状，反而对其高歌赞扬，称赞中国前途一片光明。与之相反，在那些旨在救国图存（汉民族国家）的人看来，未来的征途是没有欢乐，没有希望。而未来的希望恰恰是在充满了绝望之情的“悲哀之声”（“哀乐”）里。只有“悲哀”才是人生的正路，末世的“哀乐”的响起，还尚可证明这人心还未“寂寞”，国运惨淡，却仍未“萧条”。而遗憾的是，曾经在中华大地奏响“哀乐”的“哀弦”（屈原）早已不复存在了。放眼世界，那些国难临头的民族尚有“哀乐”在回响，在鼓舞那些在寂寞、悲哀、愤恨、绝望中挣扎的人们前进，前进。而莫如中国般“寂寞”。一国之国民文学由“种性”（民族性，国民性）“境地”（环境）“时序”（时代精神）三部分构成（法国 H. 泰纳著《英国文章史》²⁹）。有人认为，不能将这三者统一的人就无法理解这种国民文学。而周作人认为由于“人情”是人类共通的情感，所以，外国的文学也可以被中国人所理解。因此，他开始着手介绍那些正饱受苦难的国家的“新声”（波兰、乌克兰、斯拉夫诸国及犹太的“哀声”）。关于这么做的理由，周作人会这样解释道：“譬涉彼田野，以采香草。总不能用，钦其芳泽，拾袭藏之亦人情夫。”因此，周作人再次对那些顾览“北邙”（坟墓）以怡情者，心日醉于浮华，因不惜弃绝国，皈依异域者加以强烈的批判。其次是那些高谈政治为干禄之谋者。而称本篇则是送给中国人士唯一的希望（“特希知海外犹有哀弦，不如华土之寂寞耳夫一人向隅，满坐为之不乐，况在今兹。”）。最后，他总结道：“薤露虽伤，而奏诸蒿里，不得谓之失时也。尼采曰：‘唯有坟墓处，始有复活。’吾亦以是为小希焉尔”，借此期待中国“哀乐”的诞生。

A、B 两篇论文都或明或暗地反映出了那些反对封建体制，试图建立共和制度并复兴汉民族国家的论者的希求。

总而言之，周作人认识到，为国家的悲惨现状而感到“悲哀”的中国文人（知识分子）拥有上述的正确的文学观，也认识到海外诸国还有“哀弦”的存在，“哀乐”的奏响。由此，他深切感到中国亦有出现“哀乐”的必要。借用外国的“哀乐”而创作那些能够活跃在中国舞台上的作品，也就是让中国的“哀弦”奏响“哀乐”，使闻者（读者）受其影响，而思想解放，精神深化，进而成立中华共和国，拯救汉民族于危难之间。这样，周作人便写下了以上两篇文学论，并着手于“哀乐”的翻译和在国内的传播。藤井曾在他的论文《鲁迅·周作人的〈国民〉与文学——〈河南〉杂志登载论文比较研究——》³⁰中说：“周作人可能认为只要把外国的‘心声哀乐’介绍到中国，就会鼓舞国民精神，使中国获得新生”，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只是周作人针对中国“哀弦”不响，“哀乐”不鸣这一阶段的次要策略。介绍外国作品到中国的真正目的是培养中国自己的作家，改革中国文学³¹。周作人将题目定为《哀弦篇》也是别有用心。同时，在研究周作人用文学来改造国民思想这一构想之时，同样不能忘记，他不只是希望别人来创作小说和诗歌，自信对文学有着透彻的理解的他同时也希望自己能参与小说和诗歌的创作（但当时，相较于诗歌，他对于小说创作还是怀有更高的热情）。周作人认为，如果自己没有找到小说和诗歌，特别是小说的创作目的，那么通过文学来改造国民性的构想就无从谈起。总之，支撑起他通过文学改造国民性的这一构想的其实是小说家意识与诗人意识，特别是小说家意识，这样说来并不为过（后来，导致这一构想放弃的原因之一，可能就是他自己小说家意识与诗人意识的丧失）。这种小说家意识与诗人意识（二者可以合称“文人意识”）的形成是在留学日本之前的南京求学时代（1901~1906）³²。

怀抱着国民性改造这一理想，周作人迎来了辛亥革命的爆发与中华民国的成立。但是，民国成立以后所发生的陶成章暗杀事件给了他沉重的打击，使他对陈腐依旧的中国社会现状与中国国民性的忧虑进一步加深。因此，他先后在《越铎日报》上发表了《望越篇》³³、《望华国篇》³⁴、《尔越人勿忘先民之训》³⁵、《民国之征何在》³⁶四篇文章。在开首的《望越篇》中，他指出了由道德、习俗以及信仰长期作用而形成的“种业”——即国民性遗传的可怖之处。并进一步指出，对于摆脱了 260 年的满族专制统治的共和国来说，当下正是改良两千年来中国政教中“以愚民为事，以刑戮慑俊士，以利禄招黠民，益以酷儒，莠书助张其虐”所催生的“种业”的绝佳时机。而正是由于其为“种业”，因此让中国人改过自新，走向“新生”并非易如反掌，国民性改造也是前途未卜。但是，这种悲观的出现正是由于他期待着中华民国的成立能够为改造现实提供契机。从一开始，周作人就把国民性改造工程看成一个长远的目标，因此，他会悲观，却从来没有过绝望（周作人看来，对中国来说，革命与民国时代的到来太过迅速了）。在第二篇《望华国篇》中，他痛斥了暗杀同属汉民族的革命

功臣陶成章这一行径的“耻辱”和“罪恶”，并告诫国人一定要靠断绝“耻辱”之路的“悲哀的力量”，去“真心忏悔”。此外，作为“报仇雪耻之乡”的越人，虽苦心十年终于一雪沦为异族（满族）臣子之“耻”，但如今却忘记了“先民之训”，出现了妄图破坏独立的“耻辱”行径。《尔越人勿忘先民之训》中，便表达了作者对此事的担忧。最后的《民国之征何在》则指出，中华民国虽为异于满清政府的共和之国，而其区别仅在于浙东地区又出现了一个小朝廷，本质上却与满清专制体制无异。可以说，这四篇文章篇篇都瞄准中国人恶劣的国民性发动了猛烈地攻击。

周作人认为，如果听任这种恶劣的国民性肆意发展，必然导致历经周折才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的毁灭。为了让中华民国名至实归，并防止它的毁灭，国民性改造是一个不得不解决的难题。因此，他把辛亥革命中悬而未决的国民性改造（将来改造成“人”）问题当成了自己的问题，把国民性改造工作当成了自己最重要的工作。继留学时代之后，他不仅继续从事小说创作与外国小说的翻译工作，还致力于生物学、善种学（优性学）等科学知识的启蒙。此外，他还把儿童教育作为国民性改造工作的重要一环加以重视，并为此从事童话、歌谣的研究，外国童话翻译与介绍，及中国童谣收集等工作。深刻认识到为了国民性改造而进行的学术研究的必要性，并身体力行的周作人，全力拥护学生们为国民性改造而制定的学术振兴计划，并积极支持他们的活动³⁷。学生们也很可能是受到了师长周作人的影响才创办了彗社的。而对时代与国民性抱有深切忧虑的周作人为以讽刺时代与国民性为目的的《笑报》撰稿也是理所当然的。

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移向主题《活孙国》的内容上来。这个没有血肉，几乎由骨架搭成的小品世界被分为“猿国”的“类猿人”与“人国”的“人”与充当“旁观者”（“我”与“老人”）的过客。周作人通过这篇作品到底想要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由于该文现在只有后半部分存世，本研究受到必然的局限，因此如果将来前半部得以重见天日的话，那么以下的研究成果很可能会有若干需要纠正之处，特此说明。

“类猿人”每天嚼骨头（自相残杀，啃食受害者骨头）。他们没日没夜地忙于麻将和性交，但是不用心思，虽变得牙齿坚硬，目光明亮，而脑袋却仅如茶碗一般大小，看起来一副“不猿不鬼”的样子。而且由于毫无休止的自相残杀，导致人口剧减，几乎到了绝种的边缘。愚蠢的他们并未察觉到危险的降临，依旧故我地沉浸在毫无节制的肉欲当中。这显然是在讽刺当时中国人的生存状态。鲁迅留学时代曾坚持“伦理的进化论”，认为人如果不改变自己的心，违反进化的法则，必将导致自身的灭亡。周作人的这篇小说中，也不难发现这种理论的身影。也就是说，中国人如果违反进化法则逆流而上，最终将退化到猿猴的阶段。更加意味深长的是，在鲁迅的《狂人日记》中所提出的中国社会就是“互相吃”（“互相伤害”）的“吃人社会”这一观点，早在周作人的这篇作品中就已经有所体现了。这大概是因为日本留学时代的两人建立起共同的认识的缘故吧。

“人国”的人们试图通过劝谏“类猿人”，以改变他们的生存方式。但他们愚不可及且性格顽劣，无可救药，于是人们便心灰意冷，打消了劝诫的念头。也有（人国中的）激进派则主张将他们斩尽杀绝，而又恐尸体腐烂，引发瘟疫。结果是弃之不顾，任其自生自灭。“人”由于痛恨“类猿人”，很早以前，就封了城外的山，规定永不再登“猿国”。而如今，他们也成了与“我”和“老人”无异的“旁观者”了。也就是说“类猿人”已经被唯一试图拯救自己的“人”所抛弃了。而把“人”与“类猿人”置于对立的位置上，与《狂人日记》中所说“真的人”、“不吃人的人”可谓异曲同工。

作为“旁观者”中作者的化身“我”（老人同样是从他乡到此的旅者）虽身为“旁观者”，而却对“人”与“猿”有着浓厚的兴趣，于是向“老人”打探并在之后目送“老人”的离去。虽然他对“类猿人”若即若离，却又难以变成“老人”那样彻底的“旁观者”。此处，恐怕揭示了周作人当时复杂的心态。这里的“我”并不像《狂人日记》中主人公一样，有了自己也是“吃人社会”中的一员这样的重大发现，这可能也说明当时周作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猿国”的一员。

“老人”是从他乡云游而来的旅者。他对“猿国”与“人国”有着清醒的认识，但结果却是留下了“我”一个人撒手而去。在该作中，他被描写成最彻底的“旁观者”，对一切都冷眼旁观。

接下来，需要看一下对《活孙国》产生影响的外国作品。目前被认为对其产生影响的有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与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两篇。

先说《格列佛游记》的影响。众所周知，《格列佛游记》是假借遭遇海难的水手格列佛的游记，对当时英国社会以及普遍的人性进行辛辣讽刺的四个故事的合集。《小人国》（第一部）批判了只有豆粒大小的人类的社会的政治、宗教、战争。《大人国》（第二部）中，则借理性的“大人国”居民之口，酣畅淋漓地嘲讽了人类社会的残忍、邪恶与虚伪。《飞岛国》（第三部）讽刺了学者们不现实的思考与人们的妄图长生不老的愿望。最后一部《慧骃国》中，人类堕落成污秽不堪的畜生“耶胡”，一匹叫做“菲纳姆”的马却反而被尊为了最有理性的高等生物³⁸。这种通过旅行者的目光对社会进行讽刺的笔法与《活孙国》极为相似。显然，《格列佛游记》对周作人创作《活孙国》给予了重要的影响。周作人开始关注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还是在日本留学时代。几年之后，周作人在翻译斯威夫特的小说《育婴刍议》时³⁹，在“附记”中提到，自己在泰纳的《英国文章史》中第一次知道了斯威夫特的“冷嘲”的尖锐。而他最早言及《格列佛游记》的文章是上面已经介绍过的A论文。如上文所述，在此力排俗众以求独立，指导国民令其进步的斯威夫特被当成一个“贤哲”加以介绍。文中说，作者在创作《格列佛游记》之时，愤（“孤愤”）世嫉俗，将人类的愚蠢行径喻为“耶胡”（请参照注28）。另外，该论文批判的虽是近年来的文学论，但同时也对林纾所译《格列佛游记》也加以了批判。文中写道：“或以斯威佛

德所著《格列佛游记》为滑稽小说而易其名曰《海外轩渠录》。(中略)而斯氏《游记》则为愤世嫉俗、使酒骂座之书，满怀怨恨，于‘轩渠’(形容笑容)之名尤悖。其意所寄，多在第四篇(译本仅有第一、第二篇)。法人泰纳作《英国文章史》极称异其人，方之火中宫阙，愈见其美。译者初亦吾国通士(通达之士)，奈何独断节之，且不憚背其本旨以为题名，无亦在泥于归类之过耶？”⁴⁰日本留学时代就备受周作人喜爱的夏目漱石著《文学评论》⁴¹中，关于斯威夫特也有着详细的描述，周作人自然也曾潜心研读(第四篇、《斯威夫特与厌世文学》)⁴²。他对斯威夫特与《格列佛游记》的关注一直持续到民国成立之后。在创作《活孙国》前后那段时间里，在他的日记(《周作人日记》)中常常会出现“斯威夫特”或《格列佛游记》的字样。这足以证明，周作人在创作《活孙国》时的确是直接参考了《格列佛游记》⁴³。在他1922年创作的短篇小说《真的疯人日记》中也可以看到明显的《格列佛游记》的影子。这一点伊藤德也在他的《周作人与斯威夫特〈育婴刍议〉——关于其翻译》⁴⁴中已经明确指出过了。

另一方面，周作人对于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关注与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一样始于日本留学时代。周作人最早提及该书的是前文介绍过的B论文。如前文所记，论文结尾处引用了该书的一句话：“唯有坟墓处，始有复活。”⁴⁵此外，文中还有一处引用了该书的内容(“尼采之《察罗多斯》有言：‘吾于诸载册中惟爱人，血所书，书以血。’若会知血者神也，则吾今此撰集是篇之意也。”⁴⁶)。周作人在他的《望华国篇》中也引用过前者(“唯有坟墓处，始有复活。”)。在五四新文化时期，周作人在他的《祖先崇拜》(1918年3月)中也引用过该书的一句“你们不要爱祖先的国，应该爱你们子孙的国……你们应该将你们的子孙，来补救你们自己为祖先的子孙的不幸。你们应该这样救济一切的过去。”⁴⁷，强调变“祖先崇拜”为“自我崇拜”(子孙崇拜)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尼采对他的影响一直持续到这一时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一本“波斯人祖先查拉图斯特拉用比喻与讲故事的方式描述了到达‘超人’层面的过程的别出心裁的书”⁴⁸。众所周知，“超人”和“永劫回归”是该书的两大主题。那么，《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对《活孙国》到底有何影响呢？其中之一便是主人公，年轻的改革家查拉图斯特拉的生存方式。只是《活孙国》中并没有一个与查拉图斯特拉完全吻合的人物出场。其中的“老人”被描绘成一个无意劝诫“类猿人”改邪归正的彻彻底底的“旁观者”，但来历不明。“人国”坐落在山上，四周被“猿国”包围，而最终“人国”中再也没有人愿意探访“活孙国”了。而就曾一度试图规劝“类猿人”这一点来说，他们还是带有查拉图斯特拉色彩的。而作者的替身“我”也被描绘成一个隐含着成为查拉图斯特拉的可能性的人物。总而言之，除了“类猿人”之外的其他角色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查拉图斯特拉的色彩。无论如何，《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主人公虽身为“旁观者”，后来还是下山劝人们改邪归正。而“活孙国”的人物中，没有一个去感化“类猿人”。此处，也道出了作者当时深切的忧虑。此外，沉浸于“互相蚕食”等快乐中不能自拔，并必然招致从“人”逐渐退化以至于

种族灭绝的“类猿人”的出现也是二者的共同点之一。这其中所包含的“伦理的进化论”显然是受到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影响。最后，两者均采用了对话的形式，这一点可谓一目了然。

多年以后，鲁迅逝世不久，周作人创作了一篇回忆鲁迅留学时代的文章《关于鲁迅之二》（1936年11月7日）。根据文中记载，鲁迅非常喜爱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直将它搁在桌上以备阅览，并翻译了其中的序文。而关于自己与该书的关系，他有过这样的叙述：“尼采之进化论的伦理观我也觉得很有意思，但是我不喜欢演剧式的东西，那种格调与文章就不大合我胃口，所以我的一册英译本也搁在书箱里多年没有拿出来了。”如其所述。留学时代以来，周作人多次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话，但“搁在书箱里多年没有拿出来了”明显与事实不符。而“不喜欢演剧式的东西，那种格调与文章就不大合我胃口”恐怕是邂逅了该书以来，周作人的真实想法。他接触尼采，大概是受到了对自己关怀备至的文学前辈鲁迅的影响的缘故吧。鲁迅的存在无形中成为了周作人的一个重担，而随着两人的分道扬镳（1923），周作人如释重负，这也使他能够率直地表达出自己对尼采的看法。可能在创作此文时，对于断交多年的鲁迅的忌讳让他自觉不自觉地写出了“搁在书箱里多年没有拿出来了”这样的话吧。

民国成立伊始，周作人对国民性改造还抱有些许期待，这种期待随着政治环境与社会环境的不断恶化而日渐衰微，而绝望之情则日益增长。《活孙国》正是创作在这一时期。当时袁世凯在保守派的支持下开始对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进步力量进行残酷的镇压。他废除了现代化的教育，大肆推广以孔子崇拜为核心的道德教育。为了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他采取了政治制度整顿等措施，强行推进中央集权式复古政策。《活孙国》正表达了一个地方文人对国内“畸形”现状以及在这种畸形现状中登场的人物的辛辣讽刺与强烈批判。1914年9月，袁世凯发布总统令，要求“祭天祀孔”。翌年（1915），他再掀帝制运动（第二年失败）。随着危机的加剧，伴随周作人的绝望感也愈加强烈。1916年秋季，他虽然写下了这篇作品，却迟迟未能投稿，整个人陷入了沉默之中。他几乎变成了与《活孙国》中的“老人”一样彻底的“旁观者”了。而打破这个沉默，再一次慷慨陈词，则是1917年翻译《古诗今译 Theokritos 牧歌》与《希腊古诗》⁴⁹以后的事了。

迫使周作人打破这种沉默的直接原因，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同年七月爆发的复兴清朝的张勋复辟运动⁵⁰。这场闹剧不久就以失败告终，但是对于周作人来说却是一个极大的刺激。因为在他看来，民国的根基已经被动摇。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深刻认识到，光靠胡适所提出的“文学革命”（变文言为白话）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其之上再附上“思想革命”（“思想改革”）。因此，他着手用白话文翻译古希腊诗歌，并发表在“文学革命”派阵营实际上的机关报《新青年》上。

《活孙国》在周作人小说创作的轨迹上到底占据着怎样的地位呢？笔者在

15年前的拙论《周作人小说创作轨迹及其意义——以〈社会小说 江村夜话〉的问题为中心——》⁵¹中介绍了周作人的小说创作轨迹并探究了其中的内涵。但由于《活孙国》等几篇小说重见天日，对周作人小说创作轨迹进行一次再整理十分必要（※为拙论发表之后才得知其存在的作品）。

篇名	文体	署名	发表刊物	发表日期
1、《好花枝》※	文言	萍云女士	《女子世界》第13期	1905年
2、《女猎人》※ ⁵²	文言	萍云女士	《女子世界》第13期	1905年
3、《孤儿记》（单行本）	文言	平云女士	小说林社	1906年6月
4、《黄昏》 ⁵³	文言		未发表 原稿遗失	1911年冬作
5、《活孙国》※	白话	仲密	《笑报》第138号	1914年6月3日
6、《江村夜话》	文言	启明	《中华小说界》第7期	1916年7月
7、《真的疯人日记》	白话	槐寿	《晨报副鐫》	
编者小序				1922年5月17日
一、最古而且最好的国				1922年5月17日
二、准仙人的教员				1922年5月19日
三、种种的集会				1922年5月21日
四、文学界				1922年5月23日
8、《夏夜梦》	白话	槐寿	《晨报副鐫》	
一、统一局				1922年8月19日
二、长毛				1922年8月20日
三、诗人				1922年8月20日
四、狒狒之出笼				1922年8月22日
五、汤饼会				1922年8月24日
六、考试一				1922年8月27日
七、考试二				1922年8月28日
八、初恋				1922年9月1日
9、《星里来的人》	白话	槐寿	《晨报副鐫》	1923年4月1日
10、《抱犊谷通信》	白话	子荣 ⁵⁴	《语丝》第12期	1925年2月2日
11、《一个求仙者的笔记抄》	白话	子荣	《语丝》第17期	1925年3月9日
12、《仲篪先生》※	白话	陶然	《北新》第3卷21·22	1929年11月1日
13、《村里的戏班子》	白话	难明	《骆驼草》第5期	1930年6月9日

众所周知，鲁迅曾经有过一个创作以唐代杨贵妃为题材的小说的构想。而周作人同样也有过一个想写却没写或者说写不了的的小说。这就是《舒幽怨》（根据《周作人日记》1905年农历3月21日记载，“思作小说《舒幽怨》未果”）。虽然并没有确切的资料作为佐证，但是这样的例子恐怕也并不在少数。然而，

头脑中的这种小说创作的蓝本，真正落实在文字上时，不见得会同样精彩。作为一篇小说，《活孙国》的完整性看起来并不高，这也客观地说明了周作人小说创作能力的不足（对于大约两年后创作的《江村夜话》，王统照评价说：“文字的隽永，与描写的技巧，在那时实是不多见的小说。”⁵⁵而客观上来说，《江村夜话》并不像王所赞的那样出色），然而这丝毫没有动摇前文所提到的“文人意识”。这并非是因为周作人没有意识到这点，而是因为他只把这一切当成是一种自我修行。正如拙论《周作人小说创作轨迹及其意义》中所论述的那样，自《狂人日记》开始，世人对鲁迅小说推崇备至。而自愧不如的周作人逐渐丧失了这种“文人意识”。一般认为，合作创作小说的两个人中如果其中一个获得了较高的赞誉，另一个则往往会产生一种深深地挫败感。而在对哥哥鲁迅常抱有敬畏和自卑双重情感的周作人心中，这种挫败感无疑是格外强烈的。

周作人小说完整性最高的当属 13、《村里的戏班子》。这本清新淡雅而几乎是随笔的作品，如实地证明了较之小说，随笔才是最适合周作人的文体。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最终放弃了小说而转向与自己资质相符的小品文（美的散文），确实是对自己能力进行反复推敲之后作出的正确的选择。

注

¹ 仲密这个笔名第一次被使用是周作人留学时代所译克鲁泡特金的《西伯利亚纪行》（《民报》第 24 号[1908 年 10 月]），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多次使用，绍兴时代的使用例（1911 年～1917 年）目前发现的只有《活孙国》。

² 《笑报》上发表的原文为白话文，标点符号为笔者自行添加。

³ 陈子善《关于周作人〈怀陶君焕卿〉》（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动态编辑部《鲁迅研究动态》1989 年第 10 期，[总第 90 期，北京鲁迅博物馆，1989 年 10 月]）

⁴ 《怀陶君焕卿》现收录于《周作人集外集（上集）》（张铁荣、陈子善编，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⁵ 长庚为周作人之兄鲁迅幼时法名。鲁迅第一次用长庚作笔名发表的文章是登载在《北斗》第 1 卷第 2 期（1931 年 10 月）上的《唐朝的钉梢》。陈子善的《关于周作人〈怀陶君焕卿〉》中，根据以下理由推断《怀陶君焕卿》为周作人借用其兄法名“长庚”而作。1、鲁迅当时在北京，1915 年的《鲁迅日记》中也没有关于《笑报》内容。2、周作人为《笑报》长期撰稿人（后文详细说明）3、兄弟关系破裂以前，两人一直相处融洽，经常互相借用姓名或笔名。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50 年代初周作人在上海《亦报》上发表《焕强盗和蒋二秃子》与《陶焕卿》，之后在 60 年代初写了《法豪事件》与《中越馆》（两篇均为《知堂回想录》第一章）。这些文章中有关陶焕卿的内容与《怀陶君焕卿》的内容吻合。笔者赞成陈先生的观点。另外，《怀陶君焕卿》的作者与焕卿第一次相见是在丙午年（1906）的夏天，地点在上海。而周作人同年的夏秋之际为了留学，在处在留学期间，中途归国完婚的鲁迅的陪同下经由上海东渡日本。相遇的时间与地点都大致吻合，这绝不是一次单纯的巧合（关于周作人赴日时间到底是夏季还是秋季，一直以来没有定论。不过依据归国[1911]4 年后的 1915 年创作的《怀陶君焕卿》，这个问题大体已经迎刃而解了）。而且，自从浙江地下团体光复会成立以来，鲁迅与陶成章便同为该会同志。周作人与陶成章的相识，如前文中陈先生提到的那样，大概是鲁迅把同为光复会会员的陶成章介绍给同行的周作人的吧。

⁶ 《大家谈谈》原文如下（标点符号为笔者附加）：

章太炎先生学术文章，举世所宗。而性殊和易，且喜滑稽，尝戏为测字。以人姓名分拆得义，惜多已忘失。唯康有为之有字，云：弄得大清，大不成大，清不成

清。梁启超之超字，云：召见后便出走。刘师培之妻，名何震方，辩《天义报》主张女权，则测之曰：何者，言可人。震者，言云雨知道辰时。则殊诡而虐矣！

⁷ 陈子善的《关于周作人的〈怀陶君焕卿〉》中，把《大家谈谈》的作者“长庚”视作周作人。然而并未出示相关证据。从内容上来看，这也有可能出于与周作人一同拜听章炳麟的讲座《说文解字》的鲁迅之手。而从注5所举四个理由来看，认为是周作人的手笔应该更加稳妥。

⁸ 包括创刊号在内的《笑报》各期大部均已遗失，因此详细的创刊日期不详。但由于1914年6月3日第138号的发现，可以推断创刊日期应为同年1月17日。并且根据《周作人日记》1914年4月24日“杨一放君以笑报百日纪念见招，致函辞之。”假设当日便是百日的话，那么创刊日期应为1月15日。在此当中少数停刊的日子也确实存在，因此只能说创刊日期为同年1月的中旬。

笔者1991年3月访问上海图书馆，并获得了徐家汇藏书楼所藏《笑报》的复印件。该楼所藏《笑报》目录如下。

1914年：6月3日（第138号）～5日、8日、9日、18日～22日、24日
7月9日（第174号）、16日、17日～20日、22日、26日～28日、30日、31日

1915年：10月10日（第619号）～31日
11月1日（第641号）～5日、8日～12日

1916年：8月8日（第911号）～13日、15日、16日、18日（第922号）

《笑报》的总发行处从1914年7月3日号（第168号）开始从大路新园德律风第8号移至新河弄通商印刷局，又于1915年10月10日号发行之际，移至大路下岸雷皇殿内。

关于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现存的《笑报》所登文章（原文），计划今后将其汇总并介绍。

且仅以笔者之愚见，该藏书楼所藏《笑报》中没有鲁迅的作品。

⁹ 《越铎日报》创刊后，实权一直为主张向保守派妥协的势力所把持。对此颇为不满的改革派人士纷纷退出，并创办《民兴日报》（1912年4月20日，同年11月停刊。）

¹⁰ 时任《越社丛刊》编辑的鲁迅应南京临时政府之聘赴教育部任职。因此该杂志仅出版第一集（1912年2月）之后便宣告停刊。第一集所载周作人作品有《古小说钩沉序》（署名会稽周作人起孟，“文录”栏）、《偃曲序》（同前）、《诗铭》（同前）、《秋草园》（署名会稽周作人起孟，“诗录”栏）、《乙巳除日》（同前）、《寒食》（同前）共计6篇。但其中开首的《古小说钩沉序》视为鲁迅之作。除《古小说钩沉序》之外的5篇均未被张菊香、张铁荣编《周作人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中《周作人著译系年》收录。而其中的3首诗，陈子善已有介绍（《知堂佚诗集录》[《明报》1989年9月号]）。

¹¹ “《笑报》出现”是一则广告，1913年11月12日到16日连续五天登载于《越铎日报》。如注9所记，当时《越铎日报》已经向保守派妥协了。

¹² 绍兴鲁迅纪念馆馆长裘世雄提供。标点符号为裘士雄所加。

¹³ 根据一篇李士铭回忆《笑报》的文章（登载杂志，日期不详，裘世雄先生所提示）。

¹⁴ 《叟社丛刊》第3期（1916年6月）所载《叟社沿革志略》（杜尔梅）。

¹⁵ 《叟社丛刊》至少发行了到了第5期停刊，日期不详。第1期（名称为《叟社》）为1913年12月，第2期（名称为《叟社丛刊》）为1914年12月，第3期（名称为《叟社》）为1916年6月，第4期（名称为《叟社》）为1917年（月份不详。但是该期登载了一篇《送周启明先生北上序》，这篇文章收录于俞邦藩的《土城》。同年三月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周作人北上赴京，作者作此文送别周作人。由此可知，此刊的发行最早也应是同年3月。），第5期（名称为《叟社丛刊》，上海上午印书馆代印）为1919年1月。第4、5期现藏于浙江省图书馆。

¹⁶ 《叟社丛刊》第1期所载。

¹⁷ 《叟社丛刊》第1期所载，丁宝琪女士作。

¹⁸ 《叟社丛刊》第1、2期所载《叟社规约》中“名誉会员”一栏，第三期所载《本社社员录》中“名誉会员”一栏，第4、5期“名誉会员录”中载有周作人的名字。此外，

周作人之弟周建人的名字出现在全部 5 期的“名誉会员”一栏中。

¹⁹ 周作人为《彖社丛刊》投稿情况如下：第 1 期，《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署名周作人，“史传”栏）。第 2 期，《英国最古之诗歌》（署名启明，“丛谈”栏）、《新希腊小说三篇》（署名启明，“小说”栏）。第 3 期，《偃曲五章》（署名启明，“译丛”栏）、《一簧轩杂录》（署名启明，“译丛”栏）。第 4 期，《蜕龕印存序》（署名启明，“文艺”栏）、《一簧轩杂录》（《外国之童话》、《安兑尔然》、《波兰之小说》、《日本之浮世绘》，署名启明，“杂俎”栏）、《一文钱》（俄国斯谛普虐克著，署名启明，“小说”栏）。第 5 期，《爱情与小狗》（匈牙利育珂摩耳著，署名周作人，“译丛”栏）。其中除第 4 期所载《蜕龕印存序》（周作人作，鲁迅改订）之外的 7 篇均为笔者的新发现。前述张菊香、张铁荣编《周作人研究资料》所收《周作人著译系年》中未收录。

七篇中的第一篇《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原文为笔者最初发现。该篇现收录于上述《周作人集外集（上集）》（张铁荣，陈子善编，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此外，《周作人日记》中出现的关于彖社及《彖社丛刊》的相关内容如下（原文）。

“上午至校，录《安兑尔然传》，稿予彖社交学生陈基。”（1913 年 11 月 21 日）

“中校学生陈基、杜尔梅、屠钦越三人来，贻《彖社杂志》二本，借去《匈奴奇士录》等六部十册。”（1913 年 12 月 27 日）

“寄北京函，又《彖社杂志》一册。”（1913 年 12 月 28 日）

“彖社方假地开会，遇陈、施诸人，属主《小说》编辑事”（1914 年 1 月 18 日）

“上午同乔风往大街取名片来，以《炭画》一致‘彖社’，又赵济常君，得北京廿九日函。”（1914 年 5 月 3 日）

“得彖社函，令作文，十月期”（1914 年 7 月 11 日）

“上午寄彖社复函，阅《Beowu[o]lf》拟录梗概，为彖社作文，得北京十日函。”（1914 年 8 月 13 日）

“录エフタリオムス小说三篇，以予彖社。”（1914 年 9 月 4 日）

“上午往校，致彖社稿两篇。”（1914 年 9 月 7 日）

“上午又致彖社稿一篇”（1914 年 9 月 9 日）

“三年生杜尔梅来，不值，送来《彖社丛刊》第二期三本。”（1914 年 12 月 25 日）

“下午寄北京《彖社丛刊》一本”（1914 年 12 月 27 日）

“上午以《百喻经》一本由施侯伯交彖社。”（1915 年 1 月 21 日）

“梓生来谈，求《彖社丛刊》，予以一、二两册。”（1915 年 4 月 19 日）

“上午寄北京书两包，内《杂集》廿本，又寄赠浙江图书馆一本，分赠朱侠、祝霞城、陈伯祥、孙福源、越铎报社、彖社各一本”（1915 年 6 月 15 日）

“彖社董一心、金海观托任编辑小说，暂允之。”（1916 年 1 月 18 日）

“录旧译《拟曲》五章予彖社。”（1916 年 3 月 31 日）

“联日为彖社作《一簧轩杂记》，未了。”（1916 年 4 月 13 日）

“作《杂记》了，凡六则。”（1916 年 4 月 14 日）

“致彖社函，稿三纸。”（1916 年 4 月 15 日）

“上午收《彖社丛刊》第三期第二本”（1916 年 6 月 7 日）

“上午寄北京函，又《彖社丛刊》一本。”（1916 年 6 月 14 日）

²⁰ 根据前述李士铭回忆《笑报》的文章，最积极地为该报投稿的人有“呆和尚”（平子峰）、“天瓦”（张月楼）、“啸龙”（沈颂萱）三人。（据裘士雄先生所提示）

²¹ 为保守派所支持的《越铎日报》登载了一则“《笑报》出现”广告，也可算作改革派对保守派开了一次包含着辛辣讽刺的玩笑。

²² 《彖社丛刊》第 1 期所载“彖社規約”中“名誉会员”栏里没有杨一放的名字。第 2 期所载“彖社規約”中“名誉会员”栏、第 3 期所载“本社社员录”中“名誉会员”栏以及第 4 期所载“名誉会员录”中有其姓名。第 5 期所载“名誉会员录”中无。

²³ 1915 年 4 月 25 日《周作人日记》：“（周作人）同乔风往教育会开选举会，到者四十许人，仍以余为会长，杨一放副之”。

²⁴ 《周作人日记》中有关《笑报》的记载如下（原文）。

“下午风，冷，四十八度，作杂文予《笑报》，译书《喧嘩ノ研究》。”（1914年4月3日）

“晚五十度，阅旧《笑报》。”（1914年4月5日）

“杨一放君以《笑报》百日纪念见招，致函辞之。”（1914年4月24日）

“下午寄伊文思函，晴，作《笑报》杂文。”（1914年5月28日）

“夜，月出，作杂文一予《笑报》。”（1915年4月27日）

“下午归，得北京十四日函，以诗二首付《笑报》社。”（1915年5月18日）

“下午雨，作杂文二予《笑报》。”（1915年5月21日）

“寄《笑报》杂文二首。”（1916年2月11日）

“寄《笑报》文一首。”（1916年2月16日）

“作杂文一首予《笑报》。”（1916年3月7日）

“寄《笑报》杂文二首”（1916年3月11日）

“晚为《笑报》做杂文二首”（1916年5月4日）

“作杂文以予《笑报》。”（1916年8月13日）

“作《柳塘诗思图序》一首，先付《笑报》登之。”（1916年9月24日）

“寄《笑报》社函。”（1917年3月6日）

“检阅《笑报》所载旧作，甲寅以来凡三十五首也。”（1917年3月7日）

²⁵ 周作人在绍兴时代曾草拟了一篇《小说与社会》（《绍兴教育会月刊》第5号[1914年2月，署名启明]），文中分别记述了西洋与中国小说的历史，并阐述了小说之于国民性改造所发挥的作用，揭示了小说改革的必要性。其结论是，以近代西洋小说为蓝本，将符合大众的知识与趣味的小说内容从通俗变为高雅，将小说语言从白话改成文言，这样就可以陶冶大众之情操，改变庶民之人心。除了所用语言之外，其余主张皆与他日本留学时代，通过文学改变国民性的构想基本一致。这是创作《活孙国》之际，涉及到周作人小说观的唯一专论，自发表以来一直被埋没至今，实为珍贵之材料。该篇为笔者首次发现，现收录于前述《周作人集外集（上集）》（张铁荣、陈子善编，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²⁶ 《河南》第4期（1908年5月）与第5期（1908年6月）分载。

²⁷ 《河南》第9期（1908年12月）。

²⁸ “阐释时代精神，的然无误也”的意思是，“作者捕捉当代的精神与社会状况，并将其明白无误地展示出来。”其结果是，“黄金的时代者，视为文章极盛之时”，“衰微之时，文字亦以不竞”。可以说时代的盛衰与文学的盛衰息息相关。而周作人认为“文士非无责焉。盖世运式微之际，所有藉于文人者，在能暴露时世神情，谴责群众，以谋改造”，“大凡一国之时遇浇季，民气虽漓，亦必有少数明哲排众独起，为国人指导，强之改进者”。明哲“的具体例子，周作人举出了英国的G·屈塞逝世以后的摩洛哥利（Maroly）、加斯敦（Caxton）、《中古》时代的J·安迭生（Addison）、S·R·斯蒂尔（Steele）（“其描摹世风而诋呵之者尤至”）。不仅如此，他还特别强调了斯威夫特的“孤愤”。他说：“斯威佛德之《格利佛游记》亦成是时，愤世嫉俗，至以人世庸行托之‘耶呼’（yahoo）。”

²⁹ 泰纳的原文（原文为英文。笔者所见的为平冈升译《英国文章史》[创元社版]）与周作人的介绍文相比较，两者间存在不少差别。可见，周作人是基于自己的理解引用了泰纳的文学论的。

³⁰ 东方学会《东方学》第62辑（1981年7月）。

³¹ 藤井在上海复旦大学留学期间所发现的《河南》所载A论文与B论文，并在其论文中第一次采用。该文将其与鲁迅的文章进行比较，介绍其梗概并阐明其特质，实为意味深长之论文。然而，该论文中从论证法开始，有多处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计划收集周作人青年时代（南京求学时代与日本留学时代）所写论文、评论之类（包括序跋文）以编辑《周作人早期论文翻译集》（题目暂定，内容为原文、翻译、注释、词语索引与解说）。

³² 参见拙论《周作人——“文人”意识的成立》（《啞哑会《啞哑》10号[1978年6月]）。

³³ 1912年1月18日《越铎日报》（署名独应，“社论”栏）。有学者认为《望越篇》为鲁

迅所作（彭定安、马蹄疾《〈越铎日报〉署名“独应”的四篇〈古文〉为鲁迅佚文考》[《辽宁大学学报》1981年第5期]等），其中的确有鲁迅的参与，但原稿应为周作人所作（《知堂回想录》53《我的笔名》）。以下的《望华国篇》等三篇由于原稿遗失，因此并不排除为鲁迅所作的可能性。不过，这里暂时将其看成周作人的作品。

³⁴ 1912年1月22日《越铎日报》（署名独应，“社论”栏）。

³⁵ 1912年2月1日《越铎日报》（署名独应，“禹域秋阳”栏）。

³⁶ 1912年2月2日《越铎日报》（署名独应，“黄钟”栏）。

³⁷ 注15中所提《姦社丛刊》第4期所载俞邦藩《送周启明先生北上序》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标点符号为笔者添加）：

蠡城周启明先生，任第五中学教务有年矣。生得沾先生化雨，亦二载于兹。其学问之渊博、性情之温顺、教授之详悉、诲人之勤恳亲炙者皆所共知，无烦生之赘述。而急欲举以告人者，则在于特殊之点。吾绍自民国二年创设姦社丛刊，先生之功犹伟焉。本社丛刊出版四期，每期皆有先生著作，为吾我社光。其对于本社之热忱，可见一斑矣。丁巳春，闻先生以蔡鹤虞先生聘，任北京大学教务。然初以谓今春必不往，即往必在秋间，而其时吾级可毕业，生得受完全之教育，心竊倖之，故未尝为先生留也。不意兹者秣马束装，行在即矣。前之倖至今而大失所望，益悔前之不早留。自此以后，非特吾校乏一良师，即本社亦乏一中坚人，同人等能不戚戚于心乎。顾乐其留而不乐其往者，固吾校同学之心，吾社同人之心，亦即生之心。

³⁸ 以上均出自于《新潮世界文学词典》（新潮社，1990年）。

³⁹ 周作人译《育婴白议》连载于1923年9月7日、8日、9日《晨报副镌》，9月9日载文末尾添加《附记》（9月5日交付）。散文小说翻译集《冥土旅行》（北新书局，1927年）初次收录。同书亦收录斯威夫特散文《仆婢训》的抄译（《婢仆须知》抄：《语丝》第10期[1925年1月19日]）。

⁴⁰ 周作人非常推崇林纾用古文翻译的作品，并且自述受到了这些文章的影响（《知堂回想录》77《翻译小说》等），根据该引用文，当初周作人不吝溢美之词，称林纾为“通士”。

⁴¹ 《〈文学论〉译本序》（1931年6月18日，《看云集》[开明书店，1932年]所收）。

⁴² 请参考拙作《陶然作〈仲篋先生〉考——以作者问题为中心——》（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会编《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第2期，1988年）的开首，夏目漱石作《文学论》中关于斯威夫特之处。

⁴³ 绍兴时代的《周作人日记》中关于斯威夫特及《格列佛游记》的记载如下（原文）：

“下午同乔峰至教育会，归家已上灯矣，买《小说月报》第六册，《旅行述异》各一本。晚阅前书。”（1913年11月30日）

“阅《旅行述异》了。”（1913年12月3日）

“晚阅林译《旅行述异》了。”（1914年1月17日）

“得北京二十日函，伊文思廿日函，又《Gullivers Travel》一本。”（1914年1月24日）

“傍晚得ザガミヤ二日笺，E.P.Culverwell《The Montessori Principles&Practice》，L.Stephen《Life of Swift》各一册。”（1914年2月10日）

“中校三、四年级换用教科书，为欧文笔记、《格列佛游记》及《格林童话》，尚有《英文学史略》未到。”（1914年2月19日）

⁴⁴ 《新青年》读书会《猫头鹰》第6号（1987年9月）载。

⁴⁵ 此处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二部中《墓之歌》一章。《墓之歌》中说：“青春的诸多理想都在敌人的恶意攻击下夭折，这是多么地悲哀啊……而且坚强的意志将冲出坟墓，获得新生”（手冢富雄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央公论社《世界名著》57《尼采》{1978年}所收]，刘畅转译）。此处为以下引用文下划线部分。（引用文原文为冰上英广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岩波书店，1967年]，刘畅转译。）

我最高的希望，是既不言语，也不获救，就这样我青春的梦与慰藉，一切的一切都归于死亡。

为什么，我能够忍受这一切？为什么，我能够忍受剧痛，并将其征服？为什么，

我的灵魂又一次从坟墓中复活？

原来，我的内心中隐藏着一个无法被刺伤，也无法被埋葬之物，它坚硬无比，足以击碎岩石。这就是我的意志。岁月流转，而它却始终如一。

昔日，我的意志跟随着我的步伐，朝着自己的方向前进。它坚不可摧，永不明灭。

我的不死之身，仅在我的脚踝。最坚忍强劲的是我的意志。你还是生为脚踝，丝毫未变。你还是生为脚踝，丝毫未变。你击毁了怎样的坟茔，破墓而出的啊！

你的内心，还有我未实现的青春，生生不息。你是这得以延续的青春，你孤坐在这倒塌了的黄色坟茔上，心中还充满了希望。

原来，我的意志啊，你对我来说，就是一切坟墓的破坏者。请你变得更加强健吧，我的意志啊！唯有坟墓处，始有复活。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⁴⁶ 此处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部中《读与写》一章。“这一章中，包含尼采自我告白在内的箴言式的表达广受赞誉。是轻快且跃动的章节，是面对沉重的欢笑。”（前述手冢富雄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刘畅转译。）

此处为以下引用文的下划线部分（引用文为前述冰上英广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刘畅转译）。

在所有写下文字中，我只爱用血写下的文字。用血来书写吧！这样你就能够体会到血就是精神。

理解别人的血并非易事。我最憎恶的是那些靠读书打发时间之徒。

如果看清了读者的嘴脸，谁也不会为他们再有任何付出。这样的读者再有一个世纪，他们的灵魂必将腐朽不堪。

谁都认为读书即学习。然而以长远之目光来看，这不仅妨碍了写作，甚至妨碍了思考。

过去，精神即神明。不久后，它却成了人。而今，它已沦为贱民。

用血写下的箴言之人，不求诵读，但求默记。

⁴⁷ 此处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二部中《文化之邦》一章。《文化之邦》“痛斥了当时啃食现有的文化的恶行，表达了作者绝不依赖过去的遗产，而靠自己的双手开创未来的坚定决心。”（前述手冢富雄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刘畅转译。）

此处为以下引用文的下划线部分（引用文为前述冰上英广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刘畅转译）。

啊！我怀着憧憬，又该登向何方？我要登上那座叫做山的山，眺望我的父之邦和母之邦。

但是，我看不到故乡，一切处所都令我心神不宁，一切的门都是我旅途的起点。

那一时被拨动心弦的现代人，不过是一个陌生人，为我所耻笑。我成为了一个被逐出父之邦，母之邦的迁客。

这样，我能够爱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我的子之邦。那是在辽阔的海上，不知何方。我命令我的风帆，去寻访，寻访。

我要用我的子孙，为自己是祖先的子孙而赎罪，我要用整个未来为这个现在而赎罪！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⁴⁸ 前述《新潮世界文学辞典》。

⁴⁹ 1917年9月18日译成，11月4日付《题记》，《新青年》第4卷第2号（1918年2月15日）登载（署名周作人）。第一次发表是在《新青年》第1卷第1号（1918年1月15日）登载的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小说》（英国人W.B.Trites作，署名周作人译）。

⁵⁰ 请参考《知堂回想录》112《复辟前后（一）》，113《复辟前后（二）》。

⁵¹ 日本中国学会《日本中国学会报》第29集（1977年10月）。

⁵² 《周作人日记》中关于《女猎人》的内容如下：

“作短篇小说《女猎人》一首。”（1905年旧历3月13日）

“寄时报馆信，令补缺佚；又丁初我函，附小说六纸。”（1905年旧历3月18日）

⁵³ 《周作人日记》中关于《黄昏》的记载如下

“下午雪转为雨，抄旧作小说一首，题曰《黄昏》。”（1913年3月8日）

⁵⁴ 该笔名可能是改自一个日本女孩的名字“荣子”。荣子是周作人日本留学时代最初的住所伏见馆（本乡区汤岛2丁目）的房主乾又吉之妹。根据某中国研究者的提示，《周作人日记》中曾三次提到梦见过荣子。

“晨梦见荣子，问陋字如何写，未有一竖否，语以君写字必精进，何不为书一纸，即‘色纸’可耳，女答曰：‘うん’（好的）荣子姓乾，本乡汤岛伏见馆主又吉之妹也。”（1933年4月10日）

“晨又梦见荣子，一室共语，欲乘间说明心事，终未果，怅然而醒。”（1937年5月24日）

“又梦见。‘睡过闲花已及千，不如归家与妻眠，虽然不比他家貌，睡到天明不费钱。’”（1940年10月6日）

关于乾荣子，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66《最初的印象》中说：“我在伏见馆第一个遇见的人，是馆主人的妹子兼做下女工作的乾荣子，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女，来给客人搬运皮包，和拿茶水来的。最是特别的是赤着脚，在屋里走来走去。”叙述中举了江南女子赤足的例子并引用自己过去文章以发表赤足礼赞。引用部分看上去只不过是一个引子。而实际上，在此处插入这样一个小故事，也可能是作者为了不漏声色地纪念作者曾经暗恋过的乾荣子吧。

顺便要提一下的是，被称为鲁迅唯一之恋爱小说的《伤逝》中出现的“子君”与“子荣”一样，是改编自鲁迅留学时代所暗恋的日本女孩的名字“君子”。此观点为笔者推测，现无资料佐证。

⁵⁵ 王统照《我读小说与写小说的经过》（王统照《片云集》[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所收）。

附记：本文日文原文登载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会编《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第3期，1991年8月出版（第66页至105页）。本文为其中文译本。文中所提供信息皆指原文写作当时状况。

（松冈俊裕 信州大学名誉教授）

（刘畅 北海道大学研究院文学研究科硕士研究生）

2017年1月11日受理 2017年2月1日採録決定